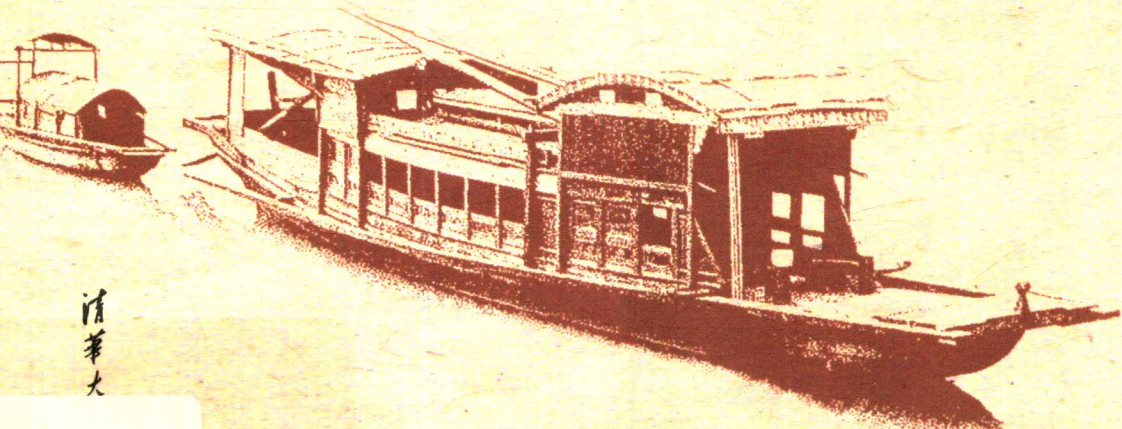


初心之源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

杨英杰等 编著



清華大

初心之源

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

杨英杰 等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心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基因 / 杨英杰等编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302-50631-7

I. ①初…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化—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8335 号

责任编辑：王如月

装帧设计：李 唯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印 张：17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产品编号：075139-01

序 言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杨英杰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作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近代以后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民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经过长期奋斗，而今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¹

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模样，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其中的艰辛与曲折、成就与辉煌，无不与文化基因有关。文化基因决定了民族性格，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路径依赖，其国家治理方式选择的唯一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特殊性，皆由此路径延展而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豪迈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²我们认为，对这一重大宣示的认识，不仅仅要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所取得的重大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不仅仅

1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要站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8 年的艰辛奋斗的高度来看待，也不仅仅要站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余年的历史进步的高度来看待，更要站在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绵延不绝的传承发展的高度来看待。

先秦文化缓慢而深刻的演进，为秦朝统一之后两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秦朝的统一为后世大一统天下观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和历史的样板。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所呼吁、所引入的西方治理模式的失败，乃是制度的异化与文化的排异所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只能是在渐进的不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达致，谁也无权拿 960 万平方公里上近 14 亿中华儿女做一场所谓的制度试验。在执政者的选择上，人民具有决定性作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先天的执政优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黏性的决定性作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¹ 美国学者 C.H. 麦基文在其所著《宪政古今》中，对宪政的生成历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西方现代宪政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土壤生发的花朵。宪政必须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不是根植于先验的构造之中。它是“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而来的实在原则”²。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 舒尔茨发现，“近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1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2 [美] C.H. 麦基文：《宪政古今》，8 页，翟小波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年。

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¹。“二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也都是不正确的。是让山就我，还是我去就山？答案再清楚不过了。任何理论都必须随着实践的要求与时俱进，任何制度都必须适合本土自发成长起来的文化文明的要求，否则只会落得个头破血流。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768.7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8年的16%。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22美元（381元人民币）提高到2018年的9462美元（6.26万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第69位，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仅仅40年，中国就取得如此成就，这是因为中国探索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²

中国经济取得如此令世人震惊的成就，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即制度的渐进演化，在保持既有政治架构基本稳定、避免重大社会风险发生的同时，制度得以平稳变迁，这得益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强大而稳定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得益于这一力量背后的文化基因。

以悠远绵长、生生不息而著称于世的中华文明，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东西方众多有识之士探究其文化基因和遗传密码。从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直至今日，中华文明不仅语言文字、饮食起居等世俗化表象未曾经历突变遽改，道德共识、舆论风习等精神化层面也几乎一以贯之。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暴兴忽亡，我们的文明传统虽然时有变幻，有过亡国、亡天下的种种忧患，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总是能回到历史

1 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轨迹上来，返本开新，再创辉煌。

讲仁爱、重民本、守信义、贵承续、推修身、知变易、崇正义、尚和合、顺自然、求大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重要组成，被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所吸纳，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成为其执政基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¹我们以为，这个“初心”之源便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本之所在。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目 录

第一章 讲仁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1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	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仁爱思想	9
第三节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15
第二章 重民本——人民是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22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	2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思想	29
第三节 人民是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36
第三章 守信义——中国人民历来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	44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观	4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信义思想	50
第三节 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60
第四章 贵承续——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66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承续观	6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扬弃思想	71
第三节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78
第五章 推修身——先从修身开始	88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修身观	8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修身思想	95
第三节 先从修身开始	103

第六章 知变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10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变易观	11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变易思想	122
第三节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30
第七章 崇正义——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136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正义观	136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思想	149
第三节 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162
第八章 尚和合——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	168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	16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和合思想	182
第三节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194
第九章 顺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4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观	20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	213
第三节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24
第十章 求大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33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	23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	243
第三节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52
后记	261

传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仁政爱民”。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仁爱观，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

《说文解字》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徐铉解释说：“仁者兼爱，故从二。”这说明，“仁”不是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是一种超越个体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它必须满足二人以上的共同体组织条件。段玉裁引《中庸》“仁者，人也”说，人的意思是“相人偶”，即它不是反身、自我的，而必须有一个对象，彼此互相致敬与相亲近；又引《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及“仁，人心也”两种不同的说法，指出“仁”既是一种人类行为，又是一种心灵追求。

当然，我们对“仁”的认识，更多来源于孔子。在《论语》中，“仁”是一个标志性的高频词。孔子对“仁”的定义可谓多矣。例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1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7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己。”¹“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²“巧言令色，鲜矣仁。”³……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是言行，是心理，是礼仪，还是政治。但无论如何解说，“仁”都代表着一种克己、利他、奉公以及亲善、关怀、尊重。这正是一种良好的共同体之间人与人关系的最佳选择。“仁”的理念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民族道德的典范和蓝本。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家的多方位多角度解释、补充，“仁”几乎已经获得了中华思想最佳代言者的地位，再由宋明理学家的发展拓宽，确立了“仁”作为人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

那么“爱”呢？依照《说文解字》，“爱”的本义是行走貌，这应该是爱慕、私相亲密的形象刻画，表达的是一种隐秘、隐藏的心理感受。后来更加上恩惠、怜宠、喜好、吝惜等多重意义。同样，这是一种面对他者的情感方式，具有与“仁”相通的共同体意义。孔子释“仁”为“爱人”，孟子的“仁政爱民”“保民而王”，又体现了儒家将“仁”和“爱”并列齐观，相提并论的人情、人性特色。仁爱二义的并驾齐驱，是民族心理和道德建设成熟的体现，也成为治国理政、和谐万姓的法宝。它是政治的、心灵的、哲学的交集公约，是文明传统的精髓所在。

我们这里谈论的仁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范例。其实，中华思想是千流归海的浩荡历程，“仁爱”的思想早就是民族共识了，孔孟不过是集大成者罢了。在同时代以及更早一些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已经从顺应天道的角度论证了仁爱的必要性。《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⁴，这已经将人的生命关切放在首位。人类的生命关切，必然不是自我实现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已从最初意义上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

1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7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15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24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4 郭彧译注：《周易》，3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和“爱”。老子虽然有“大道废，有仁义”¹的说法，但他提倡的“道”“德”与后来的“仁”“爱”是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完全重合，反映的是先民从原始的小国寡民、分散独处到统一聚合，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他的许多观察如“天之道，以有余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以不足奉有余”²反映了循天道任自然的平等思想，这本身是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仁爱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墨子“尚同”也是对平等思想的追求。“兼爱”“非攻”“爱无差等”，所反映的也正是对珍爱生命、返归淳朴的先民遗德的追怀。

究其实，由于中华民族自始生息繁衍在东亚大陆上，这里地大物博，天赐丰厚，我们凭借着温柔敦厚，刻苦耐劳，过着和乐丰足的生活，无事于无谓的争夺扰攘，久而久之，形成了顺应天时、凭借地利、依靠人和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即使这种观念在后来走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过程中有所失落，诸侯纷争，列国战乱，但是基本的道德面目却未曾置换，而是转圜变易，以适应新时代的姿态，重新写进民族性格之中。儒家的超群出众，终居百家之冠，成为此后三千年国家哲学思想的源泉，正是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双重性所决定的。在孔孟思想中，传统与时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仁爱定为民族道德基石。它既不同于复古的老庄一派的“返朴”、墨家的“兼爱”以及阴阳术数家的自然主义，也避免了走向法家、纵横家的铁血主义、独裁思想的危险，而是强调顺时而为，刚柔并济，中庸谐和的原则。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仁爱思想，无疑是从儒学取法的。

任何一种成熟了的道德思想最终会演化为恒定的政治哲学。仁爱思想既然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共识，也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格局。也正是政治实践，巩固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独尊地位。仁爱从个人道德上升为共同体精

1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1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神，对此，上古以来的政治思想都有表述。

总结上古和当世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其中有《顺民》《爱士》《上德》《爱类》等篇，都阐述了先王时贤以仁爱制胜的道理。类似的著作《淮南子》也一再强调这一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修务训》里“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¹，这也是仁爱二字联袂使用的初始，但所述事实是上古逸事，充分表明了仁爱原则不但是先民的社会风习，而且早就成为政治准则。这两部书分别成书于秦与汉，由两位政治家——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发起，网罗汇集了大量人士作为编纂者，可以说王权性质和民间性质俱备，所以可以确信，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仁爱政治思想就已深入人心了。

儒学思想的发端以及最终胜出，在于回应时代人心的变迁和政治的崭新局面。孟子说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是“圣之时也”，孔子也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²，这里的“时”与“权”，就是思想家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给出利国利民的最佳答案。一方面，中华道德传统与民族性格扎根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必须得到保护和发扬，这是一切政治和政治家作为的基础；另一方面，时代早已由小国寡民、“帝力何有于我哉”的上古时代和封侯建国的中古时代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代，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汉的一统就是这种时代变迁的反映。这种历史的演化其实从周代伊始就已经在进行了。孔子对三代各有所取，一视同仁。夏代中国确立了定居耕作的农业，人民质朴忠厚；殷商发展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人民多才好艺；周代制定了礼制，确立了天下同风，万众归心的格局，崇尚人文精神。不过孔子并不赞成越古越好，他还是赞赏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³。这是因为周代不仅继承了前两代的优秀传统，而且突出了移风

1 顾迁译注：《淮南子》，2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 张燕婴译注：《论语》，1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 张燕婴译注：《论语》，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易俗、教化整合的政权作用，这为自此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凝聚体制提供了蓝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随着这种体制的深入人心和日渐巩固，仁爱这一道德律条上升为国家意志，崇尚仁爱哲学的儒学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这样说来，基本成型的儒学仁爱哲学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具有优化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关系作用的个人道德修为和行为规范；第二，它是为统一的、具有向心凝聚力的国家政治服务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同时，为了避免这两个层面彼此分割，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完善，儒学特别强调一些基本教条，那就是孝文化的普及化以及君子阶层的培育。“孝道”对天子与百姓同样具有约束力，防止了贵族道德与平民道德的背离，同时，形成了慈孝双向运动，仁政爱民与忠君爱国同处一个层面。这样，庞大的国家和复杂的政治就有可能微缩为父慈子孝的家庭式紧凑关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国家政治方案。至于君子阶层，它的培养目标是进则为士，退则为民，可以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上通下达，沟通上下阶层的关系，保全民本政治的活力，避免贵族独裁体制带来的腐朽和僵化，也避免知识阶层成为宗教教士式的精神贵族或单纯的权力附庸。同样，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权力人事制度。现实的实践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在历史的实践中，这一道德化制度化的仁爱哲学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但儒学的这种独出匠心的设计却功不可没。完全可以说，这正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仁爱哲学的基本含义从社会共同体内部人相亲近的自然主义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个人道德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文化模式，这是历史的大事件。随着夏商周三代的沿革代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壮大，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的封侯建国模式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国与国的斗争也提上议事日程，武力的调度催化着强大的中央权威的诞生。在这种刺激下，中华大地开始了动荡。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压力对民族的考验是巨大的。这是思想文化的大机遇时刻，也是大危机时刻。一时间，诸子百家蜂起，各自以自己的思

考，试图为时代开出最有效的药方。这当中，有为现实政治战争服务的兵家、法家、纵横家，也有试图恢复旧世界的道家、墨家等派别。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未尝不可取，尤其是守旧一派对中华传统仁爱的坚守，为后世所称道。然而，这两个相左的向度，却可能导致历史的断裂和共同体的破灭。如何顺应时代保持和发扬民族的初心，把平和仁爱的传统，融汇贯彻到新的政治文化中去，这在那个争霸的年代，确属难题。孔子确立了以民间道德的慈孝为基础，以贵族道德的忠敬为约束，以君子人格的信义为调节的完整的新的仁爱原则。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定义貌似繁复多变，不主一执，孝、礼、勇、义、恭、宽、信、敏、惠等，可以说把诸多美好的道德和行为都赋予了仁。而这些善行美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民族性格传承和新时代新形势的需求。这样，孔子就极大丰富了仁爱的内涵，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每一分子的精神风格。从此，“仁”成为中华精神的名片，成为伟大人格的写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¹“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²它成了中国人努力追求的道德境界，也浸入政治、军事甚至外交等方面的考量。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经历了分殊异趣的种种变革，但总起来说，仁爱学说在个人的、精神的层面和国家的、行动的层面还是相得益彰地维护了其初始的大义。首先，大儒孟子和荀子都是仁爱学说的继承者。唐代韩愈评价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论是弘。”“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³。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虽然孟荀志趣有异，但对确立儒学的地位，确立“仁爱”在精神修养和行动实践两个层面并驾齐驱，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孟子更尊崇精神意识与道德修养，荀子则比较重视国家政治、军事、人事的行动

1 张燕婴译注：《论语》，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张燕婴译注：《论语》，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 张燕婴译注：《古文观止》，49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效果。二者都巩固发展了孔子的仁爱观念，并赋予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丰富含义。孟子的思想由于后世宋明新儒学的推崇，对国民人格的塑造功能巨大，影响比较大，值得分说。而荀子的学说也绝不让其后，尤其在清末民初，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荀子的地位声誉都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推重，这是当时的时代，呼唤中华复兴的事功心切造成的。以仁爱思想为中心的儒学，决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而是充满了行动力的、把国家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完善哲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这样成为中国人的极致追求。

孟子极大地发展了仁爱思想，尤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恻隐同情之心，孝悌廉耻之心，是孟子讨论仁爱的出发点。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¹，仁爱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政爱民，以民为本，前者突出个人品质，后者涉及政治统治原则。

从孟子的仁爱学说来看，第一他主张限制君主权力，反对暴虐独裁；第二他强调个人修养，精神追求，“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对后世的君、臣、民关系，对士人精神人格，以及对民族气质，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对于中华传统来说，这种反抗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在反对压迫尤其是反抗外来侵略时表现突出。

进入大一统的汉代后，仁爱学说正式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不过汉儒对初始儒学也有发展改造，这就是儒学史中的经学阶段。汉儒借助汉武帝促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机运，发展了儒学政治体制，将仁爱学说与君权、天意、民心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精神基础。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天命说，提出君主应率民事天。他认为天意至仁，君主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他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²，指出王正，则风调雨顺；反

1 张燕婴译注：《论语》，14 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2 赖炎元译注：《春秋繁露今译今注》，87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年。

之，则天灾人祸并至。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仁爱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¹，强调道义至上，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要顺天不能逆天，要接受圣人的教化而为善，坚决阻止“奸邪并出”。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动机不善就会受到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并相信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讖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²如此，汉儒就将帝国政治生活与仁爱原则联系起来，创立了一种适应时代，尊重传统的儒家新统。特别是灾异讖纬说，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影响持续很久。它提醒着统治者天意不可违，而这种天意实际上又是民意的另一种表达。二者之间，必须用慈孝仁爱的方式予以连接，才具有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宋明儒学直承孟子，特别重视修身养性，把精神境界视为仁爱之德追求的首要环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确定为最主要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学的仁爱观增加了物我一体、人我合一的物性统一论，这与这段时间里中国历史经历过佛教、道教与儒学的交锋、融汇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局面有关。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人权平等意识的觉醒，民胞物与，人人可为尧舜的志趣盛行，古老的仁爱学说，已不仅仅是道德高尚的士君子操守和国家政治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大众的口头禅、座右铭。同时，佛教的讲究慈悲，怜贫惜弱，道家的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都成为仁爱的当然内容。哲学家们以无极到太极，气到肉身，从肉身到道德的完整图式，论证了仁爱的必要和必然。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普及教育，又将仁爱的旨趣推向新的高峰。

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传播，礼不下庶人的戒律打破了，“天理”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仁义”成了大众性的人物标识。这些都是仁爱哲学的进化和新成果。当然，必须意识到，物极必反，道德标准的一致性和

1 赖炎元译注：《春秋繁露今译今注》，24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19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